

## 一、新政治經濟學的建立

在1817年李嘉圖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簡稱《原理》）的前後，一般都稱他所提出的這套理論體系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相信這套理論的人就稱為「新學派」（New School）。當時屬於這新學派的人士很少，不同意這套理論的人則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經濟學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朋友馬爾薩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這套理論要想在經濟學界建立相當地位自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終於成功了，其所以致此，除了他自己的功力外，最主要的是由於他能獲得兩位摯友兼門徒的竭誠協助，一位是彌爾，另一位是麥克庫洛赫。

現在我們再談談彌爾。我們知道，他們兩人早於1807年就相識，由於志趣相近且常相往來，終成為摯友。此後他對李氏所發表的論著常加讚賞，並力促李氏進而寫成一本書，俾能作較完整的發揮。李氏接受他的建言勉力進行，在撰寫其間，彌爾仍常加敦促，

最後李氏乃於1817年將《原理》一書寫成而出版。自此以後，彌爾即以李氏之門徒自居。他曾於致其友人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一函中表達，要成為這樣一位門徒所須具備的條件：第一，他必須完全接納大師所倡導的原理，並須與其大師的思想方法完全相同；同時他必須接受一個門徒必須經歷的一些必要的事前訓練；最後這一門徒必須畢生從事這一體系的宣導。（注1）由此可見，彌爾認為要作此一門徒所須條件的嚴峻，也可看出其以此自許的虔誠。

彌爾不但是一位誠篤的門徒，而且還是一位懂得運用策略的學人。例如當李嘉圖想為他的《原理》出第三版時，原本要將在此期間馬爾薩斯對他《原理》所提出的各點評論作一次答覆，因而想將他最近為此所作的一系列札記，做為第三版的附錄而刊出，彌爾則勸其不必如此處理，因為他感到1821年是將《原理》中的思想變為信仰的良機，應該切實掌握。據李氏的自述，彌爾曾勸他「要盡量避免使我的書成為一本太具爭議性的著作，他的確建議我在第三版中不要在意各種對我的評擊。」（注2）

同時，在另一方面，彌爾自己也在這一年寫了一本《政治經濟學初步》（*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完全根據李氏著作的要旨而寫成的。他在序文中就說明這是供學校使用的書籍，他自己是沒有創見的。

接著我們也可以再談談麥克庫洛赫。他當時比較年輕，正在一甚具聲望的《愛丁堡評論》擔任編輯。他在《原理》出版後的第二年，就在該刊上寫了一篇評介的文章，對於此書甚為推崇。他說：「李嘉圖先生對政治經濟學所賴以建立的基本原理曾詳加研究。他對它所做的改進工作比其他任何作者都要多，也許亞當·斯密是唯一的例外。」（注3）他還說：「它是一個協調的、一貫的和美滿的體系。」（注4）李嘉圖也向他表示「我自己的理論，經過你這支神妙的筆加以解釋以後，就顯得倍加為人信服了，……那些不能瞭解我所說的，都能非常清楚地瞭解你為我所說的。」（注5）

到了1821年，李嘉圖經濟學在學術界上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了，當時《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要將之納入它的〈補篇〉(Supplement)中，他們邀請麥克庫洛赫執筆寫這一項目。馬爾薩斯聽到這一信息後，就給《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者納卜爾(Macvey Napier)寫了一封信表示抗議說：「將我卓越的朋友李嘉圖先生的新理論編入《百科全書》，但這些理論尚未成為定論。」納卜爾將之交由麥克庫洛赫代為答復，麥氏就這樣解答，這一〈補篇〉，「不僅是要將這門科學45年來的情形加以敘述，而且還要改善它，並要擴大它的範域。同時，馬爾薩斯先生說這些新理論都尚未成為定論，這是非常奇特的錯誤，他自己就對於地租理論完全同意，而這是全部理論中最重要。」(注6)

「從此以後，新政治經濟學的『新』是不見了，但是李嘉圖的體系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同義詞。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一個新的體系就從零星的著作中發展而成，並被貼上正統的標誌。」(注7)

後來麥克庫洛赫就以該刊於百科全書中的論文為基礎，擴充寫成一本名為《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教科書，自1825年出版以來一直在英國居於首要地位，

讀者眾多。等到1848年約翰·司徒特·彌爾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初步》才被替代。但在美國則仍成為主要的教科書，一直到20世紀二〇年代為止。

在此期間，我們反觀反對李嘉圖理論體系的人，數量雖多，且其中不乏優秀人士，但都各有專業，不常相往來，有的甚至並不相識，可謂一盤散沙。例如馬爾薩斯就少能為其素所堅持之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理论贏得支持者，始終孤高自賞。而李嘉圖雖一時信服者不多，但因能與兩位親密門徒結為一體，共同為整個理論體系之發揚而努力，成績則極為宏著。所以當代偉大經濟學家之一的熊彼德就認為李嘉圖對經濟學之發展的重大貢獻是他的領導天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學派：有一個大師，一種學說，並有一群核心人士的結合。這種領導天才是無價的。（注8）

同在1821年，一件重要事件發生了，即「政治經濟學會」（Political Economy Club）的組成。創始會員有李嘉圖、彌爾、杜倫斯（Robert Torrens, 1780~1864）諸氏。它的章程是由彌爾擬訂的，其中第一條就宣布「本會會員要以他們相互間的切磋，與

政治經濟學首要原理的傳播為重要的義務。」第二條則規定會員要留意報章上的言論，要使其保持「正確的觀點」。（注9）由此可見，這不僅僅是一個辯論的團體。不久以後馬爾薩斯與辛尼爾（N. W. Senior, 1790~1864）等人也參加了。在其第二次大會中討論的主題即為「貨物普遍性的過剩可能嗎？」（Can there be a general glut of commodities?）據當時參與者的報告，「發現有兩個會員皆同意任何一個觀點」是很困難的。（注10）

到了1823年，李嘉圖不幸突然逝世了。但就當時經濟景況論是很興旺的，因而國會中兩黨人士都有眾多主張降低關稅者。當1824年麥克庫洛赫應邀出席紀念李嘉圖大會，作「李嘉圖紀念講演」（Ricardo Memorial Lectures）時，就發現在其聽眾中有輝格黨（Whig）的人士，也有執政的保守黨（Tory）內閣的閣員。儘管馬爾薩斯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政治經濟學一詞已與自由貿易的主張結合在一起，自由貿易日益增長的聲望促進了李嘉圖經濟學的傳布，使其更易為人所信奉，結果新政治經濟學也就

這樣在學術界建立起它們應享的地位。

## 二、高潮的消退

李嘉圖的理論體系在他於1823年逝世後的十年間發展到最高峰，自此以後，麥克庫洛赫仍是它堅強的辯護者，但是，一般地說，李嘉圖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已開始急速地為人所揚棄了。這有許多原因，主要的則有下列數點。第一是李氏強烈地堅持他原來在《原理》第一版中所提出的理論，雖然當時已有許多的批評，他自己也已體認到，但他以後陸續刊出的二、三版時卻都不加以修正。其中有些理論已為當時的激進份子所採擇，用來攻擊資本主義的缺陷。同時，其中有些理論也確已為事實所證明是錯誤的。例如他的一項基本理論認為利潤有下降的趨勢。亞當·斯密曾討論這一問題，他認為利潤的下降是由於資本累積增加的結果。但李氏則認為「沒有一個國家不能將其所累積的資本作有利之使用，除非工資因必需品的使用而上漲，結果所留下可作為利潤的數量已很稀少，因而